涉及2亿灵活就业人群的职业痛点如何消除？

工伤风险、『青春饭焦虑』……

数字经济时代，快递小哥、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等涉及约2亿灵活就业劳动者撑起零工经济新业态。这个庞大劳动者群体日益凸显的工伤风险、“青春饭焦虑”等职业痛点，成为两会热议话题之一。多位代表委员提交了相关建议和提案。

零工经济：稳就业“缓冲器”“蓄水池”，从“公司+员工”转向“平台+员工”模式

“零工市场”“灵活就业”引人注目地出现在今年两会的重要文件中。

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支持各类劳动力市场、人才市场、零工市场建设，广开就业门路，为有意愿有能力的人创造更多公平就业机会；“十四五”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也提出，建立促进创业带动就业、多渠道灵活就业机制。

不同于传统就业模式，在数字经济时代，灵活就业人群正日趋庞大。按人社部等部门公布的数据，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达2亿人左右。其中，很大一部分选择依托互联网的新就业形态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提交了《加快推动新就业形态发展、助力稳就业的建议》。他说，新的就业形态除在电商物流、网络送餐、网约车等生活服务领域外，还依托知识创意领域和平台不断衍生。

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等发布的《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（2021）》显示，2020年企业采用灵活用工同比增长逾11%，达到55.68%，有近30%的企业表示稳定或扩大使用规模。

马化腾表示，新就业形态具有就业容量大、进出门槛低、灵活性和兼职性强等特点，形成“蓄水池”与“缓冲器”作用，在劳动力市场中与标准化就业相互补充。

民建山西省委副主委、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志强代表说，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、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，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发展速度将进一步提升，释放更大新就业形态潜能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灵活就业改变了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传统关系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表示，劳动者从“公司+员工”转向“平台+员工”模式，也由此产生不少前所未有的利益矛盾。

痛点：工伤、养老、职业培训均难保障

部分代表委员与专家表示，对于灵活就业人群的劳动权益保障，尚存在法律依据不足、制度设计不完善等问题。

问题比较突出且频频引发社会舆情的是工伤保险缺失。“灵活就业人员在遭受工伤事故后，常常因为不能参加工伤保险而无法享受相应待遇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协副主席蔡庆锋说。

去年底，某外卖平台一骑手在送餐途中猝死，其家属在追究工伤保险责任由谁承担时，被告知仅可以获得2000元人道主义赔偿和3万元商业意外险赔偿。在社会广泛关注下，该平台最终给予骑手家属60万元抚恤金。

在灵活用工模式下，用工企业与灵活用工平台之间、灵活用工平台与工作人员之间均为合作关系，不受劳动法、劳动合同法等规制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约束。

人社部的调研显示，在缺少工伤保险的背景下，多数平台企业通过购买商业保险实现其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。但与工伤保险相比，灵活从业人员购买的商业险普遍附加值低、保障力度小。

还有部分灵活就业者由于没有缴纳养老保险，只能趁年轻拼命挣钱。记者发现，很多公司外卖骑手社保缺失。

一些代表委员建议，政府和用工方要帮助从业者解决只能吃“青春饭”问题，妥善解决社保缴纳问题。

此外是劳动者可持续发展问题。李志强说，现有职业指导、技能培训等就业扶持和服务保障体系主要面向传统行业，没有充分覆盖到新就业形态从业者。

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加快推进，新业态劳动关系规则要倾听弱者声音

政府工作报告和规划纲要草案均对相关问题作出回应。

政府工作报告指出，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，加快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。继续对灵活就业人员给予社保补贴，推动放开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。

规划纲要草案提出，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，健全劳动合同制度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，完善欠薪治理长效机制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制度，探索建立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机制。

多位代表委员提出了相关建议和提案。

蔡庆锋在《关于建立灵活就业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险保障的提案》中建议，调整现行工伤保险制度，从立法层面进一步规范此类劳动关系，避免灵活就业人员在遭受工伤事故后，无法享受相应待遇。

全国政协常委、民革中央副主席、民革上海市委主委高小玫在提交的大会书面发言《规范平台用工，维护劳动者正当权益》中建议，进一步规范平台用工合同，制订平台用工专项法规，加强劳动监察，规范平台管理，防止优势地位方滥用权利。

一些代表委员建议，拓宽灵活就业群体参与社会保障渠道，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免费在线课程和就业指导服务，建设劳动者终身学习的“数字学堂”等，以保障和服务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身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。要尽量减少互联网对劳动者“工具性”的放大，增强对个人安全、尊严、可持续发展的考量。

“新业态制定劳动关系的规则要倾听弱者声音。”许光建认为，制度设计要兼顾各方利益诉求，创造共赢的发展模式。

化解灵活就业人士的痛点，不能仅靠企业

灵活就业现象的普遍存在，对于个体来说，显然是利弊共存的。利好的一面，是个体多了一份谋生甚至改变命运的机会。比如快递小哥、外卖骑手等岗位，因为入职门槛低，很多过去没有一技之长的人，也能通过努力获得可靠的收入。而其弊端在于，相对于更稳定的企业岗位，这些岗位在风险保障、养老保障等层面，存在明显的不足。

比如前一段时间备受关注的某外卖平台外卖员送餐途中猝死悲剧中，外卖员在现有的平台保险制度下，只能获得保险公司的3万元理赔，以及平台2000元的人道主义补偿。这对于承受不幸的家庭来说，并没有多少帮助，暴露了平台在这方面的巨大疏漏。在家属以及舆论的倒逼之下，涉事外卖平台才思过整改，将骑手的保障额统一提升至60万元。

一条人命的代价，才换来这微小的进步。但实际上，这种职业风险不仅体现在外卖平台，也不仅是外卖行业，其他平台、其他灵活就业的领域，如果发生类似悲剧，后续的赔偿和保障，是否足够令人安心，依然是要追问的一件事。

这种偶发的悲剧，由于其极端性比较容易被关注到，有可能以“特事特办”的方式得到弥补，但还有更多普遍性的问题，可能相对就不那么受重视。比如快递小哥、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人士，有些没有社保，有些交的额度比较小，等他们年老之后，养老费用怎么筹措？

尤其考虑到，很多灵活就业人士都是跨省，在养老保障上面临的困难更大。在现有社保没有完成全国统筹的背景下，网约工人如果在一个城市不能缴满15年，那即便交了社保，他回乡的时候也只能带走个人账户的金额，日后等能领养老保险时，数额会大受影响。这也就是“青春饭焦虑”的重要原因，不交社保没有安全感，可是交了社保又担心将来未必能足额拿到，担心现在交的越多亏得越多。

在意外保险等领域，我们呼吁平台企业承担更大责任，尽可能找到合适的路径，让灵活就业人士能有更好的保障，而不能心存侥幸，甚至从保险费中渔利嫌疑。但这也不能仅仅依靠企业自觉，更需要有更明确的外在规则约束，让企业及时地足额地做好保障。

其次，在养老等更长远的利益保障层面，光靠企业是不现实的。目前灵活就业人士也可以自己缴社保，可是跨省转移接续等方面，存在客观的制度障碍。只有尽快消除这些障碍，才能给劳动者和企业更多选择空间。总之，随着时代发展，灵活就业人士的群体会越来越大，未雨绸缪，找准他们的痛点，一一作出针对性的安排，才能避免隐患。

本报综合新华社电、《中国青年报》

社址：慈溪市三北大街443号 邮编：315300 职业道德监督电话：63025405 发行咨询电话：63033658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3302004023005 零售：每份1.50元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慈溪日报报业有限公司印刷